
华夏早期的中原与岭南

——以《禹贡》荆州为研究对象

张振岳¹

【摘要】中原与岭南地区的交流与融合是华夏文明开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禹贡》荆州位于九州最南方位，其中心区域大抵位于今鄂湘地区，与华南地区最为接近。根据《禹贡》所言荆州之境以及境内土地、田赋以及物产，结合近年来有关岭南研究所取得的诸多进展，对《禹贡》荆州南界进行考辨，得出荆州南界所达最远处为南岭北部地区，并非《禹贡》所言“衡阳”，中原文明早在三代时期就已与岭南地区发生联系。再由“象”“齿”两种荆、扬二州共有之物进行考辨，可以发现荆州乃中原与岭南交流之桥梁，早在华夏文明早期，诸多珍贵域外贡品通过荆州地区运达中原。

【关键词】《禹贡》；荆州；中原；岭南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2-0087-8

历史时期中原的概念和地理范围不管是新石器时代还是以后的夏商周时期，其地域范围都是以河南为中心，包括陕西、山西、河北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因为这个地区在天下之中，又是平原地带居多，处于黄河中下游，因此称为“中原”^[1]。广义上的“华南”泛指中国南部。邹逸麟《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说“华南大陆海岸指广东、香港、澳门和广西的大陆海岸”^[2]。我们在此讨论涉及的“岭南”，亦以广东、香港、澳门和广西作为研究范围。荆州地处中原黄河流域和岭南地区中间，为两地区往来必经之处，因此以荆州作为切入点进行仔细研究，可窥探中原与岭南两地交流情况，这对于了解华夏文明的开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早期中原与华南往来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证明

（一）传世文献记载

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由于南方地区少数民族部落众多，一般以“百越”或“百粤”来统称分布于浙闽粤桂等地的南方少数民族部落，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吴越、勾吴、西瓯、闽越、骆越、南越、山越、山夷等。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华南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尚书·尧典》：“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3]《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4]《说苑·修文》：“禹陂九泽，通九道，定九州，……南抚交趾、大发，……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5]《大戴礼记·少闲》：“昔虞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6]“南交”“交趾”即指九州域外南部地区，说明早在尧舜禹时期中原政治文化已影响到岭南地区，并与岭南地区发生联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书》教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3BWX041）；“两汉《尚书》学研究”（项目编号：13KZW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孔子《书》教‘七观’说研究”（项目编号：13JYC770031）成果。

作者简介：张振岳，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山东曲阜 273165。

《逸周书·王会解》伊尹受商汤之命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沔深、九夷、十蛮、越沔、鬲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口𩶇之觶、蛟鬣、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7]位于商朝南部的诸多部落都曾向商朝进贡。《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8]周公摄政六年，交趾南越裳国人“以三象种译而献白雉”^[9]《吴越春秋》：“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10]由此可知，商周时期中原与岭南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且西周之时，中原的一支周人曾到达荆楚之地，与当地荆蛮发生融合。战国时期，楚国通过吴起变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1]。楚国疆域的南扩，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交往，荆楚之地成为两地区来往的必经桥梁。正如杨宽先生所说：“至少在春秋后期起，越族已经开始和华夏族融合，南越和中原的关系已非常密切。”^[12]

《竹书纪年·成王》：“二十四年，于越来宾。”“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13]《逸周书·王会解》：“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钟钟牛。扬蛮之翟。仓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余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众皆北向。”^[14]《吕氏春秋·本味》：“云梦之序。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鱣鮓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櫟，南海之柜。”^[15]又《史记》言“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从以上可知商周之时，南部诸族不仅与中原王朝有着会盟之宜，而且像“竹”“翡翠”“鱼卵”以及“柜”等诸多南方特产也都运至中原地区，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岭南地区之民俗与荆楚之地已别无两样。

（二）考古证据

关于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交流的文献记载较为欠缺，但近些年来大量的考古发掘为岭南与中原关系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材料。研究发现中原部落的文化在向四周散播的过程中有诸多路线，“其中向南的一支在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枝江关庙山都有重要线索。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洞庭湖左近的大溪文化或相类遗存的彩陶与庙底沟文化的直接影响有关……彩陶由湘水走灵渠，从贵北入西江，进入广东后一路南下，经高要蚬壳洲、东莞万福庵、深圳大黄沙等地直至香港的大湾遗址等，形成了仰韶时代的中晚期彩陶由太行山、伏牛山、武当山、武陵山东麓而下，纵向切割中国版图的格局”^[16]。

随着中原华夏族文明的不断开拓，到商朝时期，其疆域已开辟至南岭北部地区。大多学者比较倾向于“形成发展时间与楚人进逼岭南大体一致”^[17]。在河南境内诸多考古墓葬中，发掘出本应产自南海和东海地区的龟甲、海贝、海蚌、鲸鱼骨等诸多物品，这些应当是作为贡品或交换品传到中原的。^[18]在广东省宜信县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铜盃与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的铜盃形制极其接近，与广东相邻的广西部分地区亦有相当数量的商周青铜器出土。^[19]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血脉相连，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在岭南继续延伸是客观的历史事实。^[20]

从考古发现的东亚玉璋与中原青铜剑的分布图可以看出，有三个主要密集分布点，即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四川盆地地区和岭南地区，两者分布范围高度吻合。许宏认为，如果把这些相距甚远的出土地点联系起来看，可知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应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他还说，起源于海岱地区的玉璋，以二里头都邑为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直至越南北部。^[21]此乃相当精辟之观点。另外，日本学者西江清高指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位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22]。这说明夏商时期，岭南地区已与中原有所来往，并且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① 参见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161 页。



② 参见西江清高：《世界乃考古学 7: 中国 0 考古学》，东京：同城社，1999 年版。



解放前，长沙树木岭一号楚墓所出铜匕首^[23]，手柄为一奴隶形象，其大眼、高鼻，头有发髻，后垂长辫，耳系粗大耳坠，短袖打结，袒胸露乳，腰系短裙。这种形制的铜匕首，在广西战国墓中有发现，越南的东山文化中所见尤多^[24]，解放后，广西平乐银山岭发现战国中晚期墓葬出土的器物都具有楚文化的特点，有些铜戈兵器上还刻有楚国境内的地名，如：“江”，指江国，位于今河南省息县；“鱼”，即庸国，位于四川奉节县东；孱陵，今湖北公安县。^[25]很明显这些带有楚国地名的制品是由楚国境内带到岭南地区的。近年来，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也发现葬式和出土器物特点与长江流域出土的楚文化相同的战国墓葬，广东清远、四会、德庆、肇庆、始兴、罗定等地，广西恭城、平乐、宾阳等地都曾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墓。^[26]

结合以上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可知在华夏文明早期，中原地区与华南地区间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已然相当频繁，并且在来往过程中各部落民族间发生融合，两地区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成为华夏文明开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是两者联系的必经之地，担任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荆州——中原与华南的交融点

(一) 荆州南界——中原与华南交往的最前沿

《禹贡》荆州，历来多数学者认为其区域包括今湖北、湖南以及两广部分地区，春秋战国时为楚国所有。荆州之位置极为

特殊，其北界与豫州相邻，南部抵达“衡阳”，是中原地区与华南地区的交界点。然关于荆州南界却众说纷纭，《禹贡》也只给出了“荆及衡阳惟荆州”的简单叙述。新时期应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新的研究进展，对荆州之南界进行新的考辨，这有助于了解早期中原文明与南方部落交往情况，从而有利于更深入探究华夏文明的开拓进程。

《禹贡》云：“荆及衡阳惟荆州。”即“荆”为北界，“衡阳”为南界。传曰：“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孔疏》曰：“以衡是大山，其南无复有名山大川可为记，故言‘阳’见其南至山阳也。”此说以字义为解，荆州南界当抵达衡山之南，较为笼统。胡渭引《水经注》云“经曰衡阳，不知所极”^[27]，其指出《禹贡》荆州之南界只不过在衡山之南，越过衡山之后，并没有具体的止境。因此，关于荆州南界问题，如果仅按《禹贡》所述“衡阳”，所言极为模糊。熊禾《尚书集疏》云：“荆州之境亦广，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岭，即越之南徼也。越虽上古未通，已当在要荒之服。”熊禾之意是说荆州之南界当过五岭到达南越之地。胡渭按《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曰：“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阳，大抵及岭而止。”^[28]

“五岭”之称，最早见于《史记·张耳陈馥列传》：“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裴驷引《汉书音义》曰：“岭有五，因以为名，在交趾界中也。”司马贞引《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贵阳、揭阳，斯五岭。”^[29]《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裴驷引徐邈曰：“五十万人守五岭。”张守节引《广州记》云：“五岭者，大庾、始安、临贺、揭杨、桂阳。”又引《舆地志》云：“一曰台岭，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骑田；三曰都庞；四曰萌渚；五曰越岭。”^[30]《晋书·地理志》载：“交州。案《禹贡》扬州之域，是为南越之土。秦始皇即略定扬越，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娇，时有五处，故曰五岭。”^[31]《淮南子·泰族训》：“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注曰：“五岭：谭城之岭，九疑之塞，番禺制度，南野之界，射干之水。”^[32]《楚辞·九思》中也有“迫中国兮连狭，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岭兮嵯峨，观浮石兮崔嵬”的记载。以上所述“五岭”，张守节说当最为相近。

对“五岭”位置考察记载最为详细的当属酈道元《水经注》，《温水》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迂阻，信幽荒之冥城者矣。”《湘水》云：“越城峽水南出越城之峽，娇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之戍，是其一焉……冯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峽，五岭之第四岭也。其山多锡，亦谓之锡方矣。”《湊水》卷曰：“山，即大庾岭也，五岭之最东矣，故曰东峽山。”《鍾水》卷曰：“都山，即都庞之娇，五岭之第三岭也。鍾水即峽水也。”《耒水》卷曰：“县有渌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酤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酈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峽，五岭之第二岭也。”根据酈道元的考据，可以总结出“五岭”应当是峽山、萌渚、都山、大庾岭、黄岑山五座山。

近代学者曾运干《尚书正读》云：“州境当今湖北、湖南、贵州、广西诸地。唐虞疆域，以交趾为极南，故曰分命羲叔宅南交为明都矣。”^[33]其意思是说荆州之南界当越过衡山到达交趾，因《尧典》中以南交为南方极远之地，此说是也。

《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曰：“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3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云：“在今广西桂江流域。”^[35]《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36]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37]，西汉时零陵郡治，位于今广西全州与兴安两县之间，即今桂江上游地带，然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属于西江与桂江交汇处。又《汉书·地理志》零陵郡营道县云“九疑山在南。”^[38]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荆州刺史部分标示，西汉时营道县在今湖南宁远县南。《宁远县文献》关于九疑山的记载：“在县南六十里。山有九峰，各导一溪。形式相似，游人疑惑，故名九疑。”^[39]由此可发现，“苍梧之野”“零陵”“九疑山”等大抵位于今湖南省宁远县以南，即今湘粤桂三省交界处。经后人考证，有学者发现苍梧、九疑、零陵乃是三位一体。^[40]无论如何，可见早在舜时，华夏文明已开拓至五岭北部，其活动范围远远超过了衡山之阳，并与岭南地区的部落有着密切往来。

（二）由荆州开发状况分析及物产来源看中原与岭南之联系

《禹贡》九州土地利用情况如下表：

州名	土壤质地	肥力等级	田赋等级
冀州	白壤	厥田惟中中（第五等）	厥赋惟上上（第一等）
兖州	黑坟	田中下（第六等）	厥赋贞（第九等）
青州	白坟、海滨广斥	田上下（第三等）	赋中上（第四等）
徐州	赤埴攻	田上中（第二等）	赋中中（第五等）
扬州	涂泥	田下下（第九等）	赋下上（第七等）
荊州	涂泥	田下中（第八等）	赋上下（第三等）
豫州	壤、下土坟墟	田中上（第四等）	赋上中（第二等）
梁州	青、青黎	田下上（第七等）	赋下中（第八等）
雍州	黄壤	田上上（第一等）	赋中下（第六等）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按土壤质量肥沃程度从高到低顺序排列，依次为雍、徐、青、豫、冀、兖、梁、荆、扬，按田赋等级从高到低排列为冀、豫、荆、青、徐、雍、扬、梁、兖。值得注意的是，荊州土壤质量排倒数第二，但田赋等级却排第三，仅次于开发程度较高的冀、豫二州，远高于同位于南方的扬、梁二州，这说明荊州在中原与华南地区的交流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此碰撞，而荊州也因南北频繁交往而受益，使其开发程度远高于南方其他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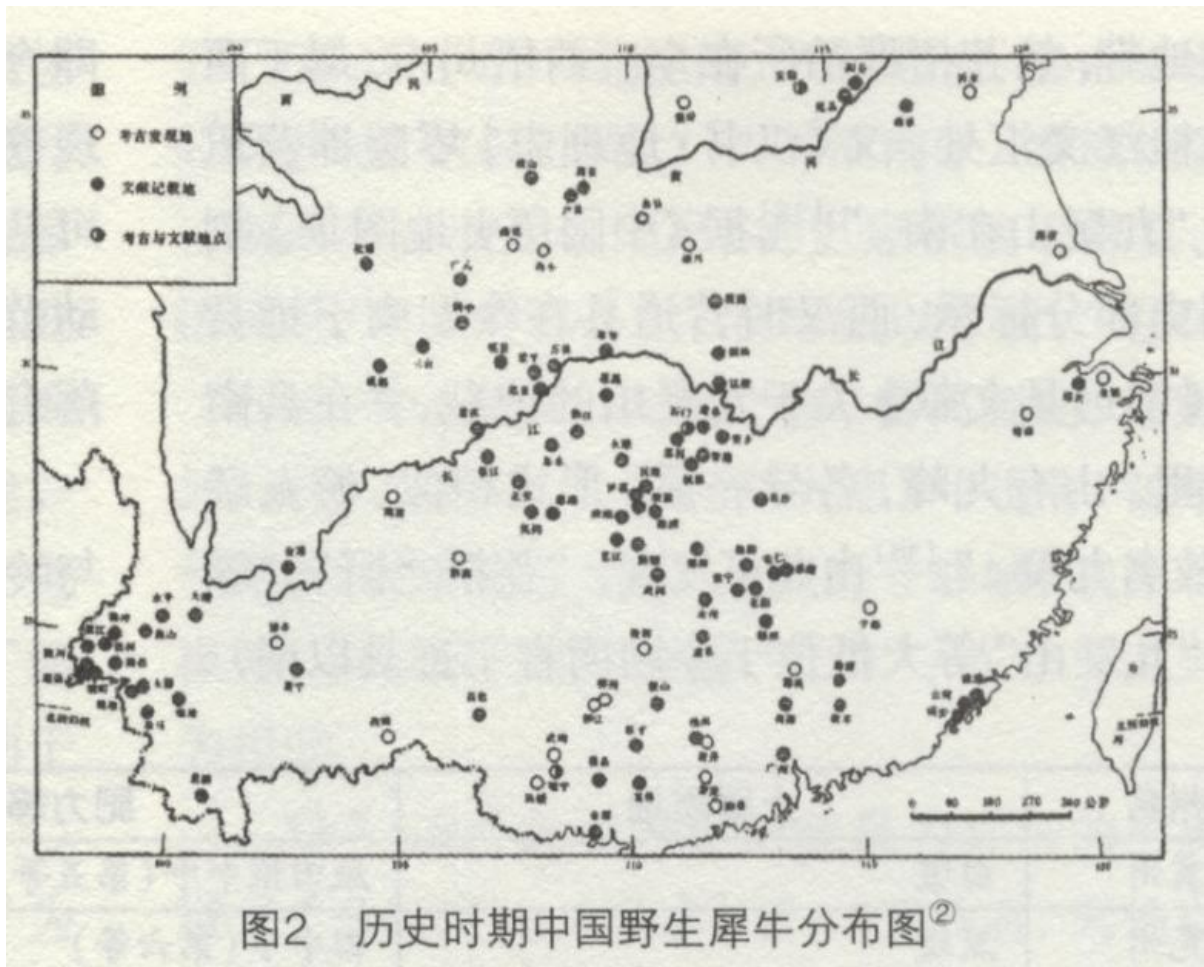
《史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汉书·地理志》：“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臝赢蛤。”可见先秦两汉时期，长江流域依旧保持着较为原始的自然环境，生存条件相当恶劣，但却“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瑁、果、布之凑。”现将九州之贡品列为下表：

州名	特产贡品排列以及数量
冀州	无
兖州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漆丝、筐织（共 4 种）
青州	盐蜃、海物、岱畎丝、臬、铅、松、怪石、麋丝（共 8 种）
徐州	羽畎夏翟、峴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玄纁、缟（共 6 种）
扬州	金三品、瑶、琨、筱、蕩、齿、革、羽、毛、木、（鸟夷）织贝、橘柚、锡（共 13 种）
荊州	羽、毛、齿、革、金三品、桃、干、栝、柏、砺、祗、努、丹、菌、蜃、桔、匭、菁茅、玄纁、玃、组、大电（共 22 种）
豫州	漆、臬、蜃、梓、筐纁、锡（共 7 种）
梁州	青黎、谿、铁、银、镂、罍磬、熊、罴、狐、狸、织皮（共 11 种）
雍州	球、琳、琅玕（共 3 种）

可以发现各州贡品数量种类上，荊州最多，达 22 种，其次为扬州，共有 13 种。值得注意的是，被我们认为开发程度较高的北方地区的几个州，贡品比较单一，甚至帝都所在地冀州竟无特产之叙述。南方的扬、荆、越贡品种类数量远远超过北方，这一方面说明北方开发程度较高，农业发达，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要部分；另一方面说明南方人口稀少，开发程度低，自然环境还较为原始，因此生物种类还比较多。《国语·楚语》：“楚之所宝，齿、角、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韦昭注云：“龟，所以备吉凶。珠，所以御水灾。角，所以为弓弩。齿，象齿，所以为珥。皮，虎豹皮也，所以为茵韃。革，犀兕也，所以为甲冑。羽，鸟羽，所以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音。”^[41]由此可知，齿，大多指象牙制品，革，乃为犀牛皮制品。传曰：“（荊州）土所出与扬州同。”正义曰：“扬州无齿、革，此州先羽、毛者，盖以善者为先。”由此可知，诸州之物产叙述皆以善品为先。扬州以金三品、瑶、琨为善，荊州以羽、毛、齿、革为善。经众多学者研究发现，自古荆楚之地、

扬越之地皆盛产亚洲象，甚至在南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过象入广陵、象入建业的记载，淮南丘陵一带还出现过数百头的象群。^[42]





从图2中可以发现，扬州的亚洲象分布密度比荆州大，而扬州几乎没有犀牛分布，只有几个零散地点，荆州犀牛分布密度³却极大。《禹贡》扬州贡品中，不以齿、革为善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首先是不以齿为善，荆、扬二州皆有大量亚洲象分布，且扬州之分布密度甚至大于荆州，荆州以齿为善，但扬州却未以齿为善，通过分布图可以发现，亚洲象除了荆、扬二州有大量分布外，在岭南地区以及云南南部地区亦有着极为广泛的分布，按此，可得知：荆州之象寡于扬州，但荆州却以齿为善，其原因可能是：荆州所贡之齿，除来源于域内象齿外，亦有大量部分从岭南地区换取缴纳而来；其次是不以革为善，以上图观之乃因扬越之地犀牛分布较少，但从文献记载来看，长江下游及浙东一带曾经有过相当数量的犀牛生存，《国语·越语》记载吴越之战时“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吴越春秋》记越王军队“皆被兕甲”，江苏新沂的一个汉代古墓画像上有多种动物，其中就有一兽“其状若犀，唯三角，张口，翘尾”^[43]。南京童家山一墓葬中出土的泥质黑衣陶犀牛“昂首瞪目”^[44]。江浙一带至今仍是水乡之国，从历史文献结合考古发现分析，先秦时期该地亦是适合犀牛大量生存的。《汉书·地理志》：“（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岭南地区水土丰茂，分布着大量的象、犀之属，且被商人们运往中原进行交易。《盐铁论·力耕》：“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玕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馀里……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又《崇

① 参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80 页。

② 参见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62 页。

礼》云：“中国所鲜，外国贱之，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鹄。”胡渭在解释旄牛之属时云，当属于九州域夕卜之物，物以稀为贵矣。^[45]此说正矣，这说明中原王朝有视域外之物为珍宝的习惯自古有之，《禹贡》贡禹之物有相当一部分当亦来源于九州之外。晋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说：“犀出武陵、交州、宁州诸远山。”苏颂《图经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诸州，世传荆蛮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粤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诸国乃多白象。”可见楚地之象与域外之象有着较大区别，这也是缴纳域外象齿的重要原因。

三、结语

通过以上详细的论述分析，可以得知，荆州位于中原与岭南南北通道之间，是两地区往来联系的必经之道，担任着文化经济交流的桥梁作用。《禹贡》荆州的土地状况与田赋等级说明了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岭南地区就已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荆州在两地区来往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其开发程度超过了同时位于江南地区的其他各州，荆州贡品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超其他八州，其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环境还较为原始，生物种类还比较丰富，另一方面也和中原与岭南地区的南北往来有着重要关系。总而言之，《禹贡》荆州一章，是华夏文明早期中原与岭南地区往来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华夏文明在早期开拓进程中南北之间经济文化的融合状况。

参考文献

- [1]陈隆文. 中原历史地理与考古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31.
- [2]邹逸麟, 张修桂.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M]. 科学出版社, 2013. 605.
- [3][4]孔安国传, 孔颖达疏, 黄怀信整理. 尚书正义[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5]刘向撰, 向宗鲁校正. 说苑校正[M]. 中华书局, 1987. 490.
- [6]王聘珍撰. 大戴礼记解诂[M]. 中华书局, 1983. 216.
- [7][14]黄怀信撰. 逸周书汇校集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8][29][30][36]司马迁. 史记[M]. 中华书局, 1999.
- [9][11]范曄. 后汉书[M]. 中华书局, 1965.
- [10]赵晔撰. 吴越春秋[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4.
- [12]杨宽. 战国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267.
- [13]张玉春. 竹书纪年译注[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87.
- [15]许维通. 吕氏春秋集释[M]. 中华书局, 1999.
- [16][20]卜工. 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M]. 科学出版社, 2007.

-
- [17]黄展岳. 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J]. 考古学报, 1986, (4).
- [18][19]蒋祖缘, 方志钦. 简明广东史[M].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 [21]许宏. 何以中国. 公元前 2000 年的中原图景[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 [22]西江清高. 世界の考古学 7. 中国の考古学[M]. 同城社, 1999.
- [23]高至喜. 湖南发现的几件越族风格的文物[J]. 文物, 1980, (12).
-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信阳楚墓图版[M]. 文物出版社, 1986. 36.
- [25]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J]. 考古学报, 1978, (2).
- [26]李孝聪. 中国区域历史地理[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68.
- [27][28][45]胡渭著, 邹逸麟整理. 禹贡锥指[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 [31]房玄龄. 晋书[M]. 中华书局, 1974. 464.
- [32]何宁撰. 淮南子集释[M]. 中华书局, 1998. 1399.
- [33]曾运干撰, 黄曙辉点校. 尚书正读[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6.
- [34][41]徐元诰撰. 国语集解[M]. 中华书局, 2002.
- [35]中华五千年史第一册[M]_中华文化研究所出版, 1962. 61.
- [37]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M]. 地图出版社, 1996. 22-23, 35-36.
- [38]班固. 汉书[M]. 中华书局, 1999.
- [39]宁远县文献[M]. 宁远县编印委员会编印. 1983. 352.
- [40]何红斌, 王田葵. 帝舜葬所新考辨一兼谈钱穆先生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 (1).
- [42]蓝勇. 中国历史地理学[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84.
- [43]王恺, 夏凯晨. 江苏新沂瓦窖汉画像石墓[J]. 考古, 1985, (7).
- [44]李文明, 钱锋. 南京童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J]. 考古, 1985, (1).